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辑)

总主编/李玉明

# 晋商的兴衰

张正明

孙丽萍

/著

参观过晋商大院的人们，在对那一座座规模宏大、工艺精湛、风格独特的彰显着文化魅力的城堡式建筑惊叹叫绝的同时，也许更想知道晋商的起起落落……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复 审：甘 弋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辑)  
终 审：杭海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商的兴衰/张正明、孙丽萍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188-3

I. 晋… II. ①张… ②孙… III. 商业经济—经济史—研究—山西省 IV.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419 号

晋商的兴衰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辑)

张正明 孙丽萍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字数：302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套)

\*

ISBN 7-203-04188-3  
K · 204 定价：30.00 元(套)

##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马 烽  
姚奠中 侯伍杰

主任委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申维辰	白 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领
张国祥	张捷夫	罗广德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辑)

- 1 唐尧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
- 2 晋国史话
- 3 虞亡齿寒的故事  
退避三舍的故事
- 4 晋国大军事家先轸  
晋国音乐大师师旷
- 5 晋国商业文化  
晋国巨商猗顿
- 6 晋商的兴衰
- 7 山西古战场
- 8 山西塔文化
- 9 广胜寺与《赵城金藏》
- 10 法显西行取经  
慧远南下传教

目  
录

引子

一、晋商的崛起	(1)
二、“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6)
三、山西票号	(13)
四、著名商人与商号	(18)
五、煤矿斗争中的山西爱国商人	(24)
六、儒贾相通观与晋商经营之道	(29)
七、晋商宅院	(35)
八、晋商与中国社会	(42)
九、晋商的衰败与启示	(44)

副主编

赵任茂民

朝建立后被封为封爵，曾任工部尚书、荆州都督等要职。

宋朝建立后，晋商的商业势力的逐渐形成。山西商业与全国商业同步发展，也出现了一次大的飞跃。当时太

## 引子

人们通常说的晋商，是指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从明朝初年（公元 14 世纪）到清朝末年（公元 20 世纪初），晋商是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也是我国国际贸易中的一大商人集团，其经营规模和方式完全可以与威尼斯、犹太商人相媲美。在日本居住多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经说过：“我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我国商业能力，常常无辞答对，惟独对有长久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人，我常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是的，明清时期的晋商坚韧不拔，积极进取，依靠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精神，生金有术，聚财有方，在中国商业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这是山西人的骄傲，中国人的骄傲，确实值得我们三晋后人大大夸耀一番。

近年来，国内外的许多人都参观过晋中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以及太谷的曹家大院等清代山西商人宅院，对那一座座规模宏大、工艺精湛、风格独特、彰显文化魅力的城堡式建筑，无不惊叹叫绝。如果说那些拔地而起的深宅老院是晋商辉煌历史的见证，那么，这本小册子就是晋商光荣历史的回顾。

## 一、晋商的崛起

明清以来，晋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谈谈古代山西人经商的历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就已经很频繁了。据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载，春秋战国时的范蠡、猗顿、白圭等人，是中国最早的几位大商，其中的猗顿就在山西发迹。当时顿为鲁国的穷士，经陶朱公范蠡指点后，来到晋国的西河（今运城）一带经商，以盐起家，发财致富，又在猗氏地（今临猗县南）大畜牛羊，经营珠宝，10年之后资产胜过王公贵族，一举驰名天下。因其在猗氏地发迹，人称其猗顿，后人便将猗顿视为山西最早最好的商人之一。

到了汉代，山西出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繁荣景象，当时的代州（代县）、泽州（今晋城）、潞安（今长治一带）等地方，都成了全国商人的集散之地。魏晋南北朝以来，山西依然是全国政治军事活动的一大中心，商业活动相对频繁，出现了不少名商巨贾，像西晋时的繁峙商人莫含，“家世货殖，资累巨万”，并且在西晋、北魏政权中起过重要作用。

隋唐时期，随着并州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更加突出，商人的活动也就更加活跃了。武则天的父亲文水县人武士彟，就是一位经营木材生意发迹的富商，他在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的关键时刻，出资襄助，李唐王

朝建立以后被铨选封官，曾任工部尚书、荆州都督等要职。

宋朝建立后，随着全国市场网络的逐渐形成，山西商业与全国商业同步发展，也出现了一次大的飞跃。当时太原地区的冶铁业特别发达，交城成为全国冶铁中心之一，铁货行销全国。近代太原城内的米市街、南市街、柴市街、菜市街等街市格局，就是宋代开始形成的日用品交易市场。并州巨商夏竦、阳曲巨富张永德，都是当时驰名省内外的山西商人。

宋代之后的元代，商业仍然是相当繁荣的。13世纪有位到过山西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曾写道：山西的“商业相当发达，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武器和其他军需品更加出名。这些军械，专供皇家的军队使用，十分便利。这地方葡萄数目很多，葡萄产量十分高，其他水果也很丰富。由于大量种植桑树，养蚕业极为发达。”马可·波罗的记录，给我们描绘了昔日山西商业兴旺发达的盛况。

古代山西人经商的历史，证明山西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和丰富的经商经验，一旦出现良好的商业契机，这种传统和经验就会发挥巨大作用。因此山西人善于经商的传统与明清晋商的崛起有着承传关系，是晋商崛起的内在历史原因之一。

明清晋商兴起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山西有着丰富的盐铁等资源。以盐来说，运城盐池历史悠久，闻名全国，特别是进入明代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盐池产量猛增。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年），运

城盐池年产量已达 24 亿斤，到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又猛增到 88 亿斤，为宋代盐池产量的 4 倍之多。以铁来说，明代山西铁矿产地有 32 个州县，占当时全国铁矿产地的 12.6%，居全国第一。明洪武后期，政府取消铁业官营，山西的民营铁冶业空前发展。随着冶铁技术和铸铁工艺的提高，山西的铁产量大幅上升，铁制产品的种类也随之增加，除了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之外，还生产铁牛、铁狮子一类的工艺用品，且行销全国。再以潞绸来说，潞安府生产的潞绸早就闻名于世，到明代时潞安府已成为北方的丝绸中心，潞绸年产量在 10 万匹以上，是最畅销的产品之一。除盐、铁和潞绸之外，山西还是全国最大的煤产地之一。总之，山西丰富的物质资源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保证。

从商业地理优势上说，山西无愧于长城内外物资交流的枢纽。古代中原汉族使用的耕牛、战马和皮毛一类的产品，主要取自北方蒙古地区，而游牧民族的衣、食以及日常用品则主要依赖内地汉民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山西北临蒙古，位于两个不同经济区域的中介地带，有着南北区域物资交换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对山西商人开辟市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仅如此，自汉代起，就有蒙古草原通向中亚、北亚的两条商道：一条东起辽东，经燕山、阴山北麓，西奔戈壁阿尔泰山，再走天山北麓到达中亚；一条经漠北高原、西伯利亚高原到欧洲，人称“草原丝绸之路”。山西地理位置靠近这两条国际通道，就为山西人涉足国际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优良的商业地理条件，使晋商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然而，要想进一步得到发展，仍然需要乘得天时，也就是说需要能促进商业大发展的一个机会。朱明政权建立后，山西商人的机会真的降临了。

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政权初年，元蒙残余势力仍然经常南下骚扰边境。为防止蒙古军南下，明王朝被迫在长城沿线多处设立军镇，驻扎军队。这种军队的人数，盛时竟达 80 万之多，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军事消费区。为了解决这些军队的粮饷问题，明王朝于洪武三年（1370 年）采取了全新的办法，政府召集商人把粮食等物品运到边镇，然后换给商人食盐专卖的凭证，也就是“盐引”。商人凭借“盐引”到指定的产盐区支盐，再在指定的销盐区卖盐。这种方法，史书上称为“开中”。其实质是商人以力役、实物向政府换取食盐的专卖权，从中获得利润，同时，政府通过这个办法，解决了边军的饷需。“开中”制度的实施，对有河东盐池之利的山西商人来说，确实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许多山西商人输粮到边镇，取得河东、长芦（长芦盐区北起山海关，南至黄骅县）以及两淮盐的专卖权，然后到各地行銷。明朝中叶以后，不但河东和长芦盐的专卖权被山西商人所把持，就是两淮盐的专卖中，山西商人也占相当大的势力，与陕西、江浙盐商平分秋色。明代一位叫涂宗浚的官僚在其《边盐壅滞疏》里，提到“开中制”的实施状况：“陕西延绥地方兵马云集，全赖召买盐引接济军需，每年都有定额。往时，召集山西商人，认领两淮盐引，商人向各堡仓输粮之后发给盐引，再前去江南盐司，领盐发

卖。盐法疏通，边商获利，二百年来，没有壅滞。”总之，山西位于长城内侧，山西商人就近向边镇输粮换取盐引，比其他省的商人要方便得多。于是，晋商得天时而兴。

## 二、“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之后，“开中制”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将纳粮换盐引改为纳银换引。于是，在边地从事输粮换引的晋商及时调整了经营策略，一部分原来输粮到边镇的商人，遵循输银换引的方式，仍然在内地经营盐业，也就是通常讲的由边商转为内商；一部分人则从中分离出来，转向了多业经营。

明中叶从事盐业的晋商，主要经营两淮、长芦和河东盐业。明嘉靖、万历年间，不少山西商人寓居淮盐集散地扬州，从事盐业生意，发了大财。如襄陵人乔承统和高邦佐，洪洞人杨义，大同人李承式，都是有史可稽的在扬州发家致富的山西商人及其后裔。据韩邦奇《苑落集》载：蒲州人王瑶“货盐淮浙苏湖间，往返数年，资乃丰”。类似这样的记载，在清朝同治年间修订的《两淮盐法志》里多处出现，恰恰说明了明朝中叶之后，因经营两淮盐而发迹的山西商贾大有人在。至于经营长芦、河东盐的山西商人，原来的财力就比较雄厚，到明朝中叶以后，牢牢地控制了这两地的盐业专卖权。史籍记载：“四维父盐长芦，累资百万，而崇古盐在河东，相互控二方利。”这里提到的四维父就是

蒲州张四维的父亲，崇古就是蒲州的王崇古，都是当时盐商大户子弟，且又在朝中执掌重权，长芦、河东盐的专卖权当时就由这些官商大户家族所控制。

明中叶以后，一部分山西商人走上多种经营、多方位发展的道路，商业更加繁荣。从明朝中期到清朝初年，晋商经营的行业除盐铁之外，还有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绒货、颜料、煤炭、木材、烟草等 20 多种行业，经营规模大小不等，参加人数逐渐增多。以棉布业来说，晋商除行銷山西土布外，还在贩卖上海布匹。据记载，明朝末年，晋商到上海收购棉布，动辄出银数万两至数十万两，可见其财力之雄厚和经营规模之大；以煤炭来说，明代山西煤炭生产较为发达，大量煤炭被运往省外，当时的北京就有“烧不尽山西煤”的说法；再以铁货来说，明代山西铁业发达，铁货自然是晋商经营的主要商品，当时最出名的是潞安铁锅和铁耕农具，行銷蒙古地区和全国所有地方。铁货多产自潞安，经营者也多是潞安人。总之，明中叶以后，晋商不仅行业繁多，而且有些行业的交易还特别兴旺，充分说明了明代晋商的繁荣和发展。

随着山西商人行业经营种类的增多，晋商的活动区域得到进一步扩展。

“开中制”实施期间，晋商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方边镇和长芦、河东和两淮盐区，特别是长城沿线一直是晋商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据记载：“往大同、宣（化）府输粮纳草、军装及贩马、牛、绢、香、茶、器皿等品”，主要是山西商人。宣化府为“朝廷的北门，……河东诸盐商皆业于

此。”在张家口，“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这样的格局，沿袭二三百年。即便是开中制废除以后，山西商人因袭蒙汉通商的传统，依然活跃在长城沿线，尤其是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开始，明朝政府在长城沿线开设马市13处，据统计，仅在宣府、大同、山西（偏关）三镇，隆庆五年官市马7030匹，万历二年（1574年）官市马27000匹，万历十一年（1583年）官市马45000匹，官市马交易一直处于上升势头。马市最初是官市，随之民市也逐渐发展起来。蒙古地区的马、牛、羊、驼以及土货与内地的绸缎、布匹、棉花等交流，买卖非常兴隆，晋商则是这一边贸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大同、宣化、张家口三地，实际上成了晋商在长城沿线发展势力的重要据点。沿长城以西，主要是现今陕西西部、宁夏、甘肃等地，史籍中关于晋商“挟资贾于秦陇间”或“商秦陇”之类的记载很多很多，长城以东的辽宁地方，据明人葛守礼说，“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过半。”

除长城沿线外，北方各重要城镇也都留有晋商的足迹。北京的颜料、纸张以及干果、油、铜、铁、锅、炭等货物的经营，当时多为山西人。天津也有山西商人的活动，光绪《山西通志》载：明代“蒲州人王之鉴，商天津”；在山东，大同人陆应明于明正德初年“贾齐、鲁间”；在河南，乾隆《阳城县志》有明代阳城王海“幼从父贾河南”的记载。张四维《条麓堂集》载：蒲州人李仲芦，明成化十年（1474年）“年益长，父命商兖豫之间”。

在长江流域，除了前面提到的经营两淮盐业的晋商之

外，其他行业的山西商人从明中叶开始也活跃于江南各地。大同人杨近泉，曾“挟数千金，装游贾江淮间”。猗氏人沈江“携巨资游关陇、扬、越间”。蒲州人席铭“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蒲州人张允龄“溯江汉，西上夔峡，岁往来于楚蜀间”，儿子张四教经商，“涉江淮，南及姑苏、吴界之境”。明代浙东地区盛产丝绸，吸引了众多山西商人前去收购贩卖，明人张瀚《松窗梦语》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东南达淮海扬越，西南则蜀”，沿江沿海各个重镇集市，几乎都有晋商的足迹。

综上所述，明朝中叶以后晋商活动区域的逐渐扩大到全国，明后期文学家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总结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隋唐时曾于安徽歙县置新安郡，故歙县别号新安。此处泛指徽州商人），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旧称山右，因其地在太行山之右而得名）。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山西商人此时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由纳粟开中地区发展到秦陇、辽东、北京、天津甚至长江流域。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明代晋商已经将其活动范围推及国外，进入国际市场，据《襄陵县志》载：襄陵县西梁村商人在明万历年间就“贩于海外”，又据明人谈迁《枣林杂俎》载：“崇祯壬午（1642年）有商舶私贩日本，……其贾多晋人。”晋商对于开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到了清代，山西商人在国内市场中更加活跃，经营区域更广，资产滚动更快，在内地的盐商、茶商较从前更加富有，与政府的结合较从前更加密切。顺治元年（1644年），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向入关不久的皇帝进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果然，清朝政府就把明末在张家口贸易、资助清军入关有功的八家山西大商封为皇商，允许他们正式入籍内务府，并赐居张家口主持商务。清代山西商人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商业成就更加引人注目，除了牢牢占据国内市场优势外，还扩大了对蒙贸易，开辟占领了西北市场和国际贸易市场。

汉民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大都要经过塞北张家口和杀虎口，俗称东口和西口，山西百姓历来有走西口的习惯，咸丰初年出现的山西民歌《走西口》，表现的就是商民将入边地亲人送别的离愁别绪。在张家口地区，大商贾皆出自山右，而汾州、介休人居多。由张家口往北经多伦多至齐齐哈尔、呼伦贝尔，是山西商人对蒙古东北部贸易的一条重要商路。康熙年间，清政府为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放宽与蒙古贸易的禁令，允许汉族商民随军贸易，解决北进清军的军需和粮饷。由此开始了清代山西商人与蒙古各部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晋商组织了驼队，深入蒙古，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张家口、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三处台站开辟三条商道，用廉价的绸布、茶叶、烟酒和金属器皿及工具等生活用品，换取游牧民的各类牲畜、毛皮等畜产品和珍贵兽皮、药材。到清代中期，蒙古

地区商品交易几乎完全被旅蒙晋商控制，在多伦诺尔、归化城、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特）等地，山西商人开设了数以千百计的固定商点，交易旺季时，晋商以数万骆驼和牛马车投入运输，一派兴盛繁忙气象。近代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道：“山西行商有车帮。晋中行商运货来关外诸地，虑有盗，往往结为车帮。”每帮商队多则百余辆，少则十数辆，一名御者可御 10 余车。康熙年间兴起的由祁、太商人合办的大盛魁商号，每年运往外蒙地区仅砖茶就有 3 万箱以上，生烟 2000 多囤（每囤 180 包，每包 0.5 公斤），从外蒙赶回的羊群每年就有上百万只。晋商还开辟了前往新疆的商路，如祁县、太谷商人合开的大盛魁商号的活动范围，其中就囊括了内蒙各盟旗和外蒙古喀尔喀四大部，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及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塔尔巴哈台以至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晋商魄力之大、足迹之远都堪称清代商贸之最。

开拓和占领西北市场是清代晋商的又一战略目标。西北历来出产多种名贵中草药，如甘草、枸杞、麝香等，还要输出大量皮毛类商品，那里的日常用品如茶叶、布匹、绸缎则需要由外地购进，从事这种交易活动的主要就是山西商人。他们从宁夏、甘肃等地购得药材，销往河南、河北、天津、山东、湖北、湖南、上海、香港甚至远达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山西商人在宁夏的著名商号就有敬义泰、合盛恒、恒盛裕、庆泰亨等由万泉、平遥、榆次、猗氏、临晋等地商人开办的商号，当年宁夏的一半枸杞生意

就由庆泰亨包办。

清代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国外市场的开发。中国从陆路对俄贸易，山西商人最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其中规定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均可越界往来互市，从此晋商就开始了对俄贸易活动。雍正五年（1727年）双方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恰克图位于中俄边界，中俄两国各建一城，两城毗连，中方叫买卖城，俄方称恰克图，以木为垣，建造方城。在恰克图进行交易时，政府不收市税，商人因此获利甚丰。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晚清咸丰年间。山西商号在这里积累了大量资本，为山西票号的兴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仅在恰克图一地，就有实力雄厚的山西商号30余家，其中榆次常家的大升玉、独慎玉、大德玉、大美玉、大泉玉、大珍玉等“玉”字商号，占有特别重要的一席之地，另外还有祁县乔家的恒隆光商号，太谷曹家的锦泉涌、锦泰亨等商号。除了对俄贸易外，与朝鲜、日本等邻近国家也积极展开贸易，谱写了晋商国际贸易的新篇章。

当徽帮商人以沿江、沿河、东南城镇为主要活动领域之际，晋商另辟蹊径，顽强地默默开拓经营西北、蒙古以至中俄边境的贸易，困难之大、艰险之多常人难以想象，他们走西口，涉草地，越沙漠，渡海洋，踏出数以千万里计的一条条商路，积累了数以千万两计的一批批财富，时人说“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看来并不为过。